



非法睡眠 装置 2007 扎琳娜·比姆基(Zarina Bhimji, 2007年特纳奖入围艺术家)

## 伦敦城里的国际化疯狂

——以泰特美术馆为例

□卢缓 Lu Huan

## The craz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city of London

——The example of Tate

*The internationalized attempts of British contemporary art represented by Tate and Turner Prize are discreetly lingering in the sensitive zone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They will continue to conduct the international exploration of new and avant-garde art in the way of perfectly combining the seriousness of public organizations and unforeseeability of new art.*

国当代艺术的印象，同时也奠定了伦敦在欧洲的当代艺术中心地位。由此，我们试图走进那个孕育了“YBA”的一方水土，揭示当代艺术在英国的发展道路。

正如同战后提出“凯恩斯主义”来对抗美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一样，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英国当代艺术发展，是英国在欧洲范围内，以强调欧洲独立为口号的，维持自身帝国怀念与欧洲领导地位在艺术领域内的一次尝试。当然，以民间形式肇起的英国当代艺术，与英国的政府政策并不适合进行过度的联想，而泰特美术馆在80年代的重新崛起，本身就是在自身艺术投资的负面影响下，与当时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削减预算的双重压力下自谋出路的一次“独走行为”，并以民间模式经营获得一定影响之后，伴随着英国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泰特经历了一个文化身份与其所经营的当代艺术的同步转型。

所谓的文化身份的转型，主要是指随着英国政府的文化政策的变更而进行的一系列从硬件到软件的全面扩张。2000年5月，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开幕，标志着英国艺术进一步走向国际化——并通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其中不乏从组织结构、评判标准、经济构成，以及运作模式的反复变革与实践中，逐步成为一个欧洲当代艺术史所无法逾越的地标。泰特现代美术馆，也与联结泰晤士河两岸的千禧桥——人称伦敦眼的大风车一起，成为了饱受争议，却当之无愧的伦敦城的新景观。

泰特美术馆的特纳奖，兴起于80年代英国乃至欧洲艺术的低潮期，是泰特美术馆经历了一系列投资失败与负面消息的困扰后，试图重新获得在当代艺术领域地位的一次代表性努力。由于长期受到公共资金赞助匮乏的困扰，时任泰特美术馆馆长的阿伦·玻尼丝(Alan Bowness)于1984年在该馆原有的美术馆之友的基础上，以“鼓励对艺术的新发展，特别是对私人和公众收藏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对其有独特的思考”为号召，动员了一批私人收藏家与赞助者组成了新艺术之友(PNA)，推动了泰特美术馆这一时期的重要转型。此后，在特纳奖的发展历程中，从早期泰特的“新艺术之友”(PNA)成员奥立弗·普仁(Oliver Prenn)的私人赞助到90年代初英国电视四台的及时介入，特纳奖一直坚持一个非官方的专业立场，这与泰特所坚持的扶持先锋艺术与支持艺术实验的立场相协调。一个商业媒体作为出资方积极介入泰特的运作，特纳奖在评选的各个环节中的公开与宣传力度大大增强了，在媒体的放大作用下，特纳奖对于当代实验艺术的推介很快引起公众的极大争议的同时，却打下了巨大的公众基础，从而奠定了自己在当代艺术领域的主流地位。奖项的评奖标准上，因为赞助背景与运作人员的变化，特纳奖的获选者情况也一度在知名当代艺术家与艺术新秀之间反复摇摆。1984年的第一届特纳奖，在纽约居住了二十五年，并且具有短期服刑经历的马尔科姆·默勒(Malcolm Morley)被选为获胜者，以至于特纳奖在公众的一片非议声中，极其“有效”地奠定了自己对于艺术实验中前卫者的“同情者”的形象。之后的数年里，1985年霍华德·霍奇金(Howard Hodgkin)，1986年吉尔伯特与乔治(Gilbert & George)，1987年里

查德·帝森(Richard Deacon)，这些在之前的英国当代艺术格局中已经获得一定地位与声望的艺术家成为最后的赢家，使得特纳奖通过当代艺术史背书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公信力。因而，当90年代初期特纳奖最终通过年龄限制来确定对于年轻艺术家的扶持时，这种时间积累的公信力便顺利地转移到其所推选的艺术家上，直至90年代后期，一批先后在特纳奖上获得荣誉的年轻艺术家崭露头角，进而长期坚持独立创作，漠视艺术团体的英国艺术土壤上产生了一个具有很高国际声望的艺术团体——YBA。

泰特美术馆发展的十年，同时也是泰特所推崇的一批艺术家，由当代艺术中的挑衅者转而成为一种经典，并且进入历史的十年。从20世纪的70年代末以来，一方面，西方经济空前繁荣，导致了西方消费文化日益膨胀，麦当劳、流行音乐、家庭肥皂剧正随着资本进入世界各地。在越战阴影逐渐淡去以后，消费文化唤起的不再是战后的伤痛，而是对于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精神的认同。另一方面，嬉皮士之后带来的精神匮乏的后遗症越发明显，在艺术领域，战后抽象表现主义的精神追求与波普艺术的大众诉求已经在前卫的“少数派”与“多数派”两个领域内耗尽了创造力，不但艺术创作逐渐缺乏冲劲和变革的动力，而且连艺术潮流的推进也失去了标新立异的兴致，仅仅是在前人的名号上一后了之。

当20世纪80年代早期，英国艺术舞台同样疲软的关键时刻，哥德斯密斯学院的达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及其同代人，于旁人不经意间，开拓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艺术流派。赫斯特对于生物有机体的有限性十分感兴趣，他把动物的尸体浸泡在甲醛溶液里的系列作品“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其标志性作品《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就是一条用甲醛保存在玻璃柜里面的18英尺长的虎鲨，用这种挑战当时人们视觉接受限制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的颠覆性任务。以后，一批年轻艺术家继续在日常生活的素材中寻找现成品的灵感，或者用古典艺术的经典符号与民族、土著的素材相结合……总之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刺激人们以往对视觉艺术的接受限制，他们以年轻英国艺术家的缩写词YBA(Yung British Artist)流传开来。很快，那个年代的艺术家，无论是否曾在哥德斯密斯学院就读，都被冠以如此称号。

事实上，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YBA这一代的艺术家，他们选择这样一种挑战性的创作方式，本身就是在艺术市场与艺术活动双重不景气的前提下进行的一种自适性的行为。哥德斯密斯学院本身就以提倡学生的自我创造能力与对文化现象的敏感性著称，因而当经济资助的萎缩开始不足以支持艺术家的专业创作时，这批在学生时期就开始以一种前辈艺术家所不曾具有的开拓能力，自行介入展览组织、媒体联络等一系列工作，并以一种对现代媒体的运作模式与眼球经济的深刻认识，在艺术语言上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他们在观念艺术的理念上，将现成品装置——对抽象表现主义的精英意识与波普艺术的架上情结双重背离的

艺术语言，于媒材的运用上进行了大胆的突破。由此，继续了波普之后的当代艺术领域中，对颓废感与玩世主义的持续发展。特别是，YBA 的艺术家，正如其在哥德斯密斯学院所受到的影响那样，善于在作品中灌注一种对于城市化、环境、种族、性别等众多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凸现的现实问题的关注。无论外界对于这种视觉艺术中形式语言的突破持何种态度，一旦人们能够接受或者习惯这类视觉冲击以后，他们的作品都能够以其在主题与观念上的现实意义（或者现实关注），来获得被主流机构接纳，并成为经典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YBA风行的过程中，媒体与艺术收藏的推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直至今日，有的评论家仍然将其视为一次媒体与艺术商的联合炒作。YBA活动的早期，收藏家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的推广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这个因素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

艺术作品的产生、传播与收藏是一个完整的历程，他们共同构成了其从诞生直至进入历史的所有阶段。在以往的美术发展历程中，这三个阶段之间的影响与互动一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尤其是进入19世纪后期以来，伴随着公众审美趣味与艺术领域内部的价值标准的日益背离，现代艺术中精英与大众的矛盾就长期存在，这也导致了艺术创作、传播与收藏的各阶段都产生了深刻的变革。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便捷，艺术中心作为艺术市场的交易中心与重要的艺术平台的话语权所有者，比以往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起了更大的作用。当我们回顾伦敦在这十几年中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可以发现，其创造性地形成了一个艺术团体、艺术媒体与艺术收藏三家“共谋”的艺术格局。一方面，具有雄厚财力基础的艺术收藏者，通过赞助的形式扶持当代艺术的创作，另一方面，其所资助的艺术机构与媒体的结合，又能够在艺术发展的初始阶段，通过赋予其社会影响力来形成事实意义上的艺术推广，从而在创作与收藏之间形成合力。同时，这种成功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则进一步加强了以特纳奖为代表的伦敦话语权的公信力，稳固了特纳奖对于艺术潮流的指导作用。特纳奖，当这一针对英国本土的艺术实验的奖项日益提高国际效益时，便促使了英国艺术的升温，随着英国艺术的回温，特纳奖又更能够追逐于国际艺术潮流中最受瞩目的艺术家之间，同时也给其他更多的艺术家以展示自我的机会。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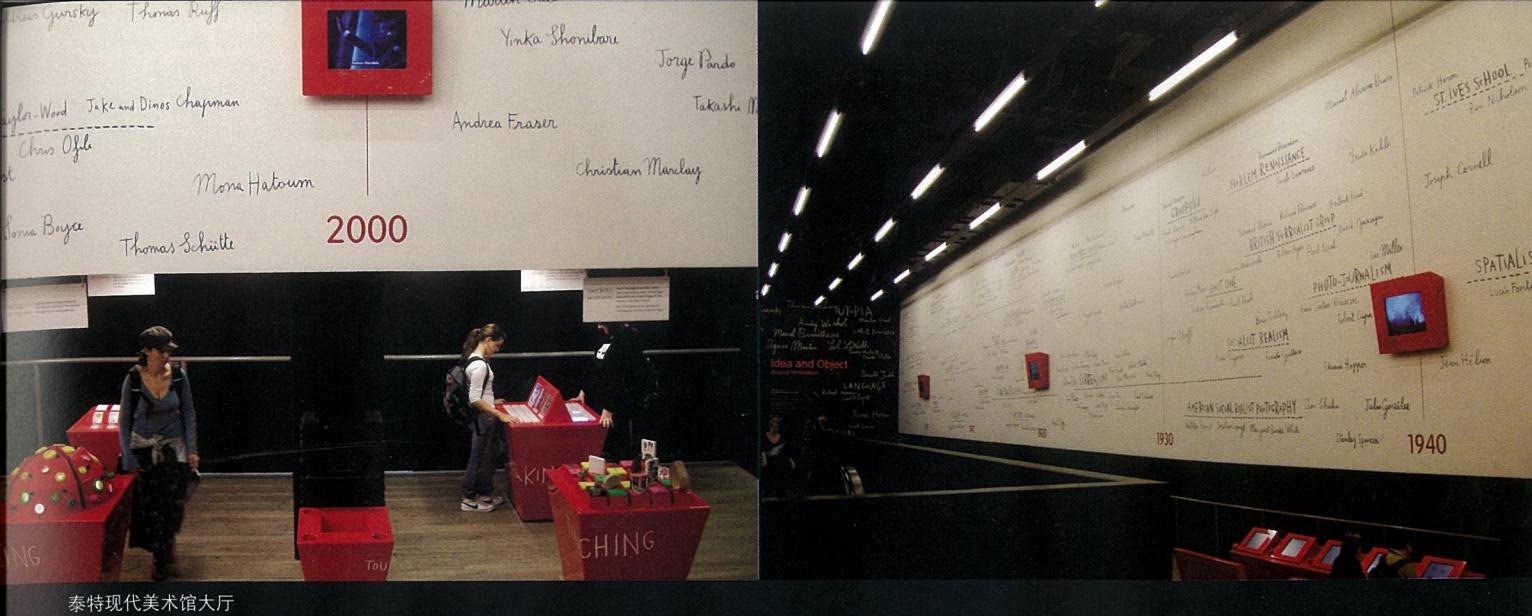
至近年来，虽然面对着以弗雷兹当代艺术博览会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的艺术经营力量的挑战，但是泰特美术馆仍然是英国当代艺术中不可动摇的力量之一。而以泰特美术馆与特纳奖为代表的英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化努力，也正小心谨慎地游走于私有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敏感地带，以一种将公众机构的庄严性与新艺术的不可预见性的完美结合模式，来继续主导面向国际的，对于新奇、前卫的艺术探索。**art**

Just as "Keynesian Economics" were put forward after the war to fight "Marshall Plan" led by US, the British contemporary art development since 60s in 20th century is an attempt in the field of art in Europe which emphasizes maintaining imperial nostalgia and British leading status in Europe with a slogan of European independence. Certainly,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link the British contemporary art in a civil form to the governmental policies. The rise of Tate in itself is a "Walk alone" influenced by the negative effect of its investment failure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cut budget of the Conservatives led by Mrs Thatcher. However, after gaining some effect by running in a civil way, Tate, with the change of British social cultural environment, has undergone a synchronous convers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contemporary art it is managing.

such a challenging way to create, which in itself is an adaptive act in the condition that art market and art activities are both recessive. Media and the promotion of art collection have such a great effect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YBA that some critics are still viewing as a joint promotion of media and art dealer up till now.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ndon in over a decade formed an innovative situation that art organizations, art media and art collectors ha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On one hand, financially strong art collectors support the crea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by sponsor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ponsored art organizations and media implement an art promotion with their social influence at the beginning stage of art development, which create a joint power between creation and collection. This example effect strengthens the public credibility of critics in London represented by Turner Prize and thus solidifies its role as the leader of art trend. Turner Prize helps to heat British art while this experiment aiming at British local art is raising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Moreover, with the heating of British art, Turner Prize manages to be chased by the artists that are paid most attention to in the international art trend and also it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more other artists to give themselves a full play.

(All images provided by the Tate Gallery)



泰特现代美术馆大厅

## 泰特美术馆的前世今生

### Tate Gallery Yesterday and Today

□编译：龚莹滢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ong Yingying

*The original Tate Gallery, at Millbank in London, opened in 1897. Its official name was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British Art, but it became popularly known as the Tate Gallery, after its founder Sir Henry Tate.*

提到英国的当代艺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肯定是“泰特美术馆”(Tate Gallery)——这个在1897年以泰特爵士命名的艺术圣地，不仅仅聚敛了英国艺术的历史，更收藏了英国艺术的今天，甚至预示着世界艺术的未来。

早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一向执着于英国本土传统艺术收藏的泰特，开始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世界，并于1917年开始正式展开对世界现代艺术的收藏。伴随着当代艺术在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视觉的刺激和观念的突变不断撞击着我们曾经对艺术的定义，这也使得泰特美术馆终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决定另行开设一座新馆，专门针对新世纪背景下不断涌现的现、当代艺术，这就是后来伦敦最受欢迎的美术馆：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而老泰特则更名为“泰特大英美术馆”(Tate British)。旧址基础上的泰特大英美术馆，依然紧扣传统，缅怀着英伦过去500年里艺术的辉煌历史；但泰特现代美术馆则背道而驰，成为世界现当代艺术最前沿的实验场和见证者。但无论如何，新老泰特都无疑是英伦最重要的艺术机构，现在，这两个美术馆平均每年迎来送往的观众都超过600万。2000年，跨越世纪之门的泰特更摇身一变，成为四个分身，除了位于伦敦的泰特大英美术馆和泰特现代美术馆之外，还有泰特利物浦美术馆(Tate Liverpool)和泰特圣·爱斯沃美术馆(Tate St Ives)。它们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艺术角度，共同勾勒着泰特美术馆的前世今生。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欧洲的当代艺术曾经一度萎靡，但这并没有影响泰特现代美术馆，这个新兴的艺术机构受公众青睐的程度。仿佛现代艺术最初被社会排斥摒弃的阴霾已经被时间一少而空，哪怕当代艺术越来越变本加厉地超越我们对艺术的理解范围。自2000年5月开幕以来，泰特现代美术馆已经接待了超过2200万人次的参观者，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累积中。

将艺术天平向现、当代倾斜的泰特现代美术馆，一方面针对20世纪的现代艺术展开了系统的收藏，毕加索、马蒂斯、蒙德里安、达利……一批在艺术史上赫赫有名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作品，被纳入其中。最初，泰特现代美术馆按照艺术史发展的逻辑和顺序来展示作品，力图还原艺术的进程本身。但有趣的是，这样的规则很快被打破，这个从一开始就与思变联系在一起的新型美术馆，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作品秩序打乱，不再按照传统的编年史，以时间顺序来陈列和展示这些价值非凡的艺术品，或许常规的、线性的描述，不足以展现艺术的生命力和泰特自身的独特见解。因此，这些艺术品被重组，按照四个不同的主题：“历史—记忆—社会”、“人像—行动—身体”、“风景—材料—环境”以及“静物—实物—真实生活”，以艺术本身形式和观念地不同而分别呈现在我们眼前。现在，它们作为美术馆的常设展览，分别摆放在泰特现代美术馆三楼和五楼的展厅中，而中间的四楼展厅则展出一些临时性的大型展览。在美术馆负责人尼古拉斯·塞罗塔(Nicholas Serota)看来，展示方式的全新变化，将为艺术的解读带来深远的意义。我们可以于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与围绕着一个既定主题下的艺术相遇。